

公民行动：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新模式^①

李潇君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吉林长春 130024)

[摘要] 近年来, 美国公民教育学界和教育实践者倡导一种新的体验式公民教育策略——“公民行动”, 它集合了公民教育中的积极青年发展、社会-情感学习、服务学习等思想, 基于以“变革”为核心的理论, 聚焦观点表达、专业技能、集体行动、反思意识四个核心要素, 旨在推动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基于项目的、高质量的”公民教育。在实践层面, 这种教育模式被纳入美国国家和各州的课程标准, 并依托相关“公民行动”项目, 逐渐成为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主流模式。

[关键词] 公民行动; 公民教育; 美国

中图分类号: G416.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 (2020) 02-0076-07

当前, 为应对教育和赋权机会不平等的问题, 美国公民教育领域倡导一种“以行动为中心”的体验式教育教授学生公民知识和公民技能, 以促进青少年发展。“公民行动”(action civics)教育模式正是基于这一理念, 主张学校教育不仅应当关注社会体系中的基本要素, 教授公民学知识, 更应当让学生对改进社会体系提出自己的见解, 以集体行动推动变革, 培养反思和探究意识, 使学生具备成为积极的、负责任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以缩小低收入、弱势种族青少年与富有的白人青少年在公民知识、行为、态度方面存在的公民赋权差距。

一、“公民行动”的理论溯源

公民行动是当今美国教育界最新兴起的公民教育模式, 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全新概念, “积极青年发展理论”(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社会-情感学习理论”(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服务学习理论”(Service Learning Theory)为“公民行

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

(一) 积极青年发展理论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 公民教育界就开始转向关注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和公民参与。这种转变对高风险测试下纯粹关注学术技能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极大挑战, 启示教育者应当以培养“全人”为目标指向, 兼顾学生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或软技能的发展。理查德·勒纳(Richard Lerner)等指出, 积极青年发展理论旨在培养“五C”——能力(competence)、信心(confidence)、品格(character)、联系(connection)、关心(caring), 最终通向第六个C, 即社区/公民贡献(contribution)^[1]。斯坦福大学青少年中心主任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教授是这一理论的有力倡导者, 他认为传统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如学习障碍、情感障碍、反社会行为、动机和成就感缺乏、酗酒、吸毒、青春期心理危机等。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看待青年人的视角也影响和主导了大众传媒、公众思维以及

①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美国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项目编号: CEA15017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潇君, 女,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法学博士。

相关领域研究。相反,积极青年发展理论将青年人视为社会的“资源”而非“问题”,关注青年人包括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或过去表现欠佳的人,所展示出来的独特才华、优势、兴趣以及未来的潜能,旨在理解、教育并使他们参与到富有成效的活动中,享有充分的权利和义务,为社区的完善发展作出贡献。^[2]理查德·卡塔拉诺(Richard Catalano)等提出“积极青年发展”应包含如下教育目标:提升社会、情感、行为、认知和道德能力;培养心理弹性;建立自我效能感;家庭和社区对青年人行为提出清晰标准;增强成人、同伴、青年人之间良好关系;促进亲社会行为发展等。^[3]总之,积极青年发展理论反对消极地看待个体发展,致力于培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合格社会成员。它强调青年发展的可塑性和可持续性,是一种积极的青年发展观。

(二) 社会-情感学习理论

社会-情感学习理论的提出已有二十余年,近年来再度引起教育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家长的关注。对于它的具体内涵、维度和边界,学界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但普遍认为其核心是儿童和青年了解、管理个人情绪以及与人交往的有利方法,从而在求学、工作、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形成公民身份方面取得成功。^[4]学者们也提出不同的解释框架,如罗杰·魏斯伯格(Roger Weissberg)等认为“社会-情感学习”包含五种类型的能力:自我意识(能够明确自身的情感、思维 and 价值观以及理解它们如何指引行为)、自我管理(能够在不同情境中成功调节个人的情感、思维和行为,建立目标并为之奋斗)、社会意识(能够换位思考,理解行为的社会和伦理准则)、交往技能(能够清晰沟通、良好倾听、与人合作,抵制不合宜的社会压力,建设性地对冲突进行协商等)、负责任地决策(能够基于伦理标准、安全考虑和社会标准作出关于个人行为与社会交往的建设性选择)。^[5]斯蒂芬妮琼斯(Stephanie Jones)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的能力:认知调节(集中注意力,计划并解决问题,协调行为,作出选择)、情感过程(确认、表达、调节个人情绪并理解他人的情绪)和人际交往技能(准确理解他人的行为,有效应对社会情境,与同伴和成年人积极互动)。

研究表明,“社会-情感学习”技能是可塑、可教、可习得的。一些致力于推动“社会-情感学习”的专门性机构也相继成立,如“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协作组织”(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它支持美国50多个学区将多种多样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引入学校,并推动州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标准和指导。这些学校项目通过特定课程直接教授“社会-情感学习”技能,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方式改变学校环境和校园文化,通过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提升他们对自我、他人和周围环境的感知。^[6]目前,全美50个州都颁布了学前教育阶段的“社会-情感学习”标准,其中,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标准覆盖整个K-12阶段(幼儿园至12年级)。实践证明,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干预措施,“社会-情感学习”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减少行为和情感问题的发生,提高公共卫生状况。

(三) 服务学习理论

服务学习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课程工具和学习组织方式,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百年前,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等教育改革者就倡导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体验式学习。根据美国“国家服务法人团体”(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Service)的定义:“服务学习是学生通过积极参与有组织的服务进行学习、获得发展的方法。它满足社区的需要,与各级学校协作,与社区服务项目结合,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感;它融入核心的学术课程,并提供时间让学生反思服务体验。”^[7]尽管理论界对于服务学习有不同的定义,但对其质量标准存在普遍共识,由13个服务学习组织共同颁布的《服务学习基本要素》(Essential Elements of Service Learning)提出,有效的服务学习应当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使学科的概念、内容和技能得到具体应用;学生参与的服务有明确的目标,满足学校和社区的真实需要,对自己和他人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运用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记录和评估学生对内容与技能的掌握程度;在选择、设计、实施、评价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促进与社区的交流互动,鼓励协同合作;为服务作好预先准备,包括对任务以及

所需技能和信息的清晰理解,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等;服务活动前后及过程中的反思和批判性思考等。^[8]实践表明,服务学习能够对个体和社会发展、公民责任感、学业成就、生涯探索、学校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相继颁布有关社区服务的相关法案,从国家顶层设计上支持和推动服务学习的开展,如《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国家服务信托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Act)、《民主教育法案》(Democratic Education Act)等,服务学习得到了立法和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21世纪后,服务学习在美国得到空前发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公民服务法案》(Citizen Service Act)等都针对服务学习的内容、时长、评价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并通过实施“美国自由团”“学生服务美国”等项目,推动美国青少年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总之,服务学习是一种将社会服务与课程紧密相连的教学和学习策略,将课程任务、讨论、反思融入社区服务和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之中,促进学生知识技能的获得,并使其在关注社会和关心他人的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并有能力服务社会的人。

综上所述,积极青年发展理论、社会-情感学习理论、服务学习理论是对传统公民教育形式的超越,其中关于积极参与、体验式学习、同伴交往、协商合作等方面的研究为“公民行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经过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的不断发展与推广,这一教育模式逐渐成为当今美国公民教育的主流模式之一。

二、“公民行动”的内涵阐释

在当今美国公民教育中,教育和赋权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备受学界瞩目。梅拉·莱文森(Meira Levinson)、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研究都表明,低收入、弱势种族青少年与富有的白人青少年在公民知识、行为、态度方面存在差异,即“公民赋权差距”,这种差距和学业差距一样令人担忧。^{[9][10]}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和学界开始倡导一种新的体验式公民教育策略,即“公民行动”。

(一)“公民行动”的定义

2010年,为回应美国公民教育界对青少年公民参与的兴趣与关注,致力于推广“公民行动”教育模式的专门机构“美国国家公民行动联盟”(National Action Civics Collaborative,以下简称NACC)宣布成立,“公民行动”一词也迅速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NACC在其成立的初始纲领中,将“公民行动”称之为“复兴民主传统的宣言”(A Declaration for Rejuvenating Our Democratic Traditions),指出美国民主处在危险之中,这种危险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而是来自内部的倾向,是公民活动和公民能力的削弱。美国的民主不是一场已经赢得的胜利,而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持续关注、培育和革新,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公民进行有意义的参与。根据NACC对公民行动的界定,设计公民行动教育的目的是促使“公民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和更广范围的社会政治活动”^[11]。“公民行动”与服务学习并不完全相同。服务学习通常不带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或政治承诺,行为的动机以服务为导向,其所倡导的“为他人做事”传达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关切,使学生倾向于发展成为具有亲社会价值观、志愿主义、良好邻里关系的“负责任的公民”。这类服务更多强调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行动,学生容易获得即刻或短暂的成功体验,而不能解决体制或结构问题。^[12]因而,服务学习也隐含了一种政治伦理,即赞成维持现状,弱化社会变革。相反,公民行动是一种有指导的体验式公民教育方式,这种模式下,学生不是被教授有关公民学的知识以及进行冗长乏味的机械记忆,而是真正像公民一样行事,不但能解决自己关心的问题,同时能了解有效参与公民行动,尤其是政治行动的原则,从而参与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和其他推动变革的活动,如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联盟、提升公共意识等,而不是仅限于短期的志愿服务和改良措施。

(二)“公民行动”的实践模型

2012年,美国前任联邦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提出要在全国推行“公民行动”教育模式,并称其为“新一代公民教育”。^[13]“美国国家公民行动联盟”将基于“变革”为核心的理论(Theory of Change)作为指

导“公民行动”实践的理念和教学模型,旨在推动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基于项目的、高质量的”公民教育,以缩小公民赋权差距。

“公民行动”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直击当今美国社会被边缘化的青少年群体不能平等发表意见、公民赋权差距日趋加大的问题与挑战,聚焦四个核心要素:观点表达、专业技能、集体行动、反思意识。首先,“公民行动”提倡给予青少年分享知识的机会,在对自己、朋辈以及社区产生影响的问题上作出积极的决断。它提倡创建一种开放式的课堂氛围,莱文森曾提出这种开放式的课堂氛围能够支持真实、活跃的课堂讨论,教师通过在教学中设置争议性问题,鼓励学生深入探究和分析各种观点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自由发表见解。学生与同伴、教师的平等对话能够培养欣赏、包容、分享的情感态度,有助于塑造宽容、理解等公民品性,促使他们未来能够在学校内外广泛参与政治讨论。^[14]其次,

“公民行动”鼓励利用青少年看待学校、社区的独特视角和技能,依托相应的项目,使公共政策的讨论变得深入并富有活力。再次,“公民行动”倡导进行集体行动以推动变革,而不局限于“基于事实的、教科书取向的”公民课,重视青少年的价值观实践。最后,“公民行动”将反思和探究作为教育实践的关键环节,重视学生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培养学生的反思意识。传统的公民和道德教育是基于政治社会化与行为主义的方法灌输价值观和美德,而个体独立推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是民主社会必备的道德素养,是公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于“变革”为核心的理论成为实施“公民行动”的理念原则和路径方法。

基于上述框架,具体的教育过程由六个步骤组成,一是审视社区,分析学校、社区以及国家的优势与问题;二是确认关键问题,识别与个人相关的问题,通过根源分析,聚焦最显著的问题;三是做研究,研究并寻找促使问题解决的证据;四是制定策略,寻找社区合作伙伴,共同商定行动策略;五是采取行动,针对具体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六是反思/展示,将反思贯穿整个教育和学习过程,培养学生的领导技能,改善他们的公民实践。一些组织直接遵照上述过程,以课程或活动的方式开展公民教育,也有

一些组织通过培训教师、青年志愿者或是大学生的方式间接进行。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公民行动”模式能够产生以下教育成效:一是公民和文化转型,包括机构、组织、学校文化的转变,对学生刻板印象的转变,教学方法和课堂氛围的改善,政策、预算和物理环境的变化;二是成为21世纪积极的青年领袖,促进学生协商合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批判性思维、专业素养、主体性的提升;三是成为积极、知情的公民,学生的公民学知识增加,对选举、社区和公民参与的责任感增强,促进社会变革的公民效能感以及公民认同感提升;四是公民参与度提高,学生在关键问题上持续与政策制定者沟通交流、持续接受教育并参与倡议活动,在公众场合发表证言;五是公民创造力提升,学生在慈善、社区服务、媒体等领域充分发挥创新精神;六是学业成就提高,学生的分数、毕业率、出勤率、专业技能显著提高,大学招生和毕业人数增多等。以上既包含短期的教育成果,也包括长期的教育成就,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加强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15]

三、“公民行动”教育模式的实践应用

“公民行动”一经提出,得到了美国公民教育理论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全国性组织的广泛推广,基于以“变革”为核心的理论和实践模型,其实际应用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 纳入国家和州的课程标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教育界兴起了大规模的课程标准化运动,旨在提高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规范中小学的课程教学与评价。1993年,克林顿政府颁布《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课程标准的编制。2010年,美国正式颁布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共同核心课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对K-12阶段学生的数学和英语读写能力作出明确说明。进入21世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继续强调对学生的读写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培养,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公民能力和品性的发展,这引起了美国教育界及相关专业组织的高度关注。2013年11月,美国社会科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颁布最新修订的社会科

课程国家标准——《大学、职业和公民生活框架：社会科课程国家标准》（以下简称《C3框架》），旨在解决社会科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被边缘化的问题，鼓励学生积极进行公民参与。《C3框架》超越了《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对学生读写能力的强调，从大学、职业、公民生活三个角度构建价值目标，旨在培养有知识、会思考、积极行动的公民，为学生的大学生活、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以及未来的公民生活作准备。它突出公民实践的重要意义，并将“采取理性行动”作为最后一个维度的内容，也是最为显著和最具创新性的内容，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公共事务，与他人协商合作，采取建设性的、独立的、集体的行动，并对行动进行反思，从亲身实践做一个好公民中来学习公民学及社会科其他分支学科（见表1）。通过选举、追踪实事、加入志愿组织等活动，学生发展了未来大学和工作领域所强调的“21世纪技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态度和行为倾向，建立及信奉某种价值评价，连续将价值加以内化，形成稳定的性格特征并长期指引自身行动。从这一内容看，《C3框架》呼应了近年来兴起的“公民行动”教育模式，是倡导这一教育模式最具代表性的课程标准。标准颁布后得到大力推广，大量学者和教育一线工作者的研究与实践反馈表明，这种突出实践的公民教育模式能够显著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政治效能感，提升参与公民生活的期望和公民责任感。

表 1.《C3 框架》的组织结构^[16]

维度一 形成问题和 计划探究	维度二 应用学科工 具和概念	维度三 评估资源和 运用证据	维度四 交流结论和 采取行动
形成问题和 计划探究	公民学	搜集和评估 资源	交流和批判 结论
	经济学		
	地理	形成主张和 运用证据	采取理性 行动

美国是一个教育分权的国家，联邦政府主要通过立法和拨款两种方式对教育施加影响，而州政府有权制定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教育政策、课程标准、教学内容、考核评估办法等。尽管目前各州没有直接以“公民行动”命名的教育政策，多数州都通过行政法令支持和推动“公民行动”的开展。2018年，马萨诸塞州将一

项公民教育法案签署为法律，得到美国两党以及参议院、众议院的共同支持。该法律规定，所有学校都要教授美国历史和公民学课程，并在8年级和高中阶段为学生提供至少一项由学生领导的、无党派性的公民教育项目，这与“公民行动”具有相似的内涵与要求。同时，建立“公民项目信托基金”，为教师专业化发展、考核评估、公民学标准的实施提供专项资金支持。这是当前美国关于公民教育最全面的法律，对“公民行动”教育实践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伊利诺伊州、田纳西州、华盛顿州等也以立法的形式颁布了与“公民行动”相关的政策，为学生长久、持续地接受公民教育提供有力支持。^[17]目前，美国50个州都制定了关于公民教育的课程标准和框架，包含了“公民行动”的核心宗旨和原则，如审视社区、确认问题、调查研究、制定策略、采取行动、反思展示等，指导“公民行动”的教育实践。加利福尼亚州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历史-社会科学框架：9-12年级的教学实践》（History-Social Science Framework: Instructional Practice for Grades 9-12）中关于公民学的教学指南涵盖了“公民行动”的主要环节。例如，根据有效性、公平性、成本、结果等因素，对规则、法律以及公共政策作出评价，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提出修改或制定新的规则；通过民主协商，衡量不同观点，对有争议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作出判断；运用学科知识以及多种途径获取证据，对相关问题展开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从公民学、经济学、地理、历史等学科视角，分析特定学校或社区学校的相关问题，提出解决策略，采取个人或集体行动，在课堂之外予以展示介绍。^[18]这些课程标准都一致主张将公民教育活动与形式多样的课堂内容相融合，加深学生对公民美德、民主原则、协商程序的理解，在顶层设计上为“公民行动”提出目标要求和实践指引。

（二）依托专业组织推广“公民行动”项目——以“一代公民”为例

为了在实践层面促进“公民行动”教育模式的大规模推广，一些全国性的专业组织在美国相继成立或进行联合，如“一代公民”（Generation Citizen）、“地球卫队”（Earth Force）、“麦克华挑战”（Mikva Challenge）等。

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的宗旨、目标群体和实施模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直接实施“公民行动”项目，培训“公民行动”项目合作者（教师、青年工作者、大学生），雇佣项目工作人员和合作者。其中，“一代公民”“地球卫队”等实施的“公民行动”教育项目，在美国K-12教育阶段产生广泛影响。

“一代公民”是美国最早倡导和推广“公民行动”教育模式的非营利组织，是“美国国家公民行动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在其宗旨说明中明确提出“致力于保证所有学生都有权利和机会接受‘公民行动’教育，为使他们成为民主社会中积极参与的公民作准备”^[19]。自2008年成立起，该组织已经为美国7个州的5万余名学生提供相关课程、指导、辅助等，在全国范围内的初、高中开展以行动为导向、以课程标准为参照、以社区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的“公民行动”项目。

根据《“一代公民”2018年年度报告》（Generation Citizen 2018 Annual Report），本年度，“一代公民”共筹集资金逾470万美元，聚焦正义与平等、公共安全、卫生、环境、教育与学生心声、经济与就业等主题。如纽约市威廉斯堡学院特许学校（Williamsburg Collegiate Charter School）实施的食物安全项目，该校初中生担忧附近地区学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力图提高学校餐厅在食物种类和卫生条件方面的水准，为此他们调查研究了纽约市公立学校餐厅的管理规定，并倡议支持市议会的法案，要求学校餐厅公布卫生监督得分。2018年夏，纽约市议会将此法案签署为法律，使人们能够实时关注并问责学校用餐设施状况，扩展和加深学生在公立学校、家庭、社区中对健康食物选择的话语权。另一具有影响力的项目案例是得克萨斯州学生回应帕克兰枪击案采取的行动。2018年2月，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后，全美各地青年举行游行和抗议。得克萨斯州“一代公民”项目的课堂中，学生提出保证学校安全的若干举措。奥斯汀科林中学（Kealing Middle School）组织了“行动一天”活动，学生组织召开市民大会，与议员、奥斯汀警察局以及专业组织等进行对话。在麦卡勒姆高中（McCallum

High School），学生请求行政管理人员引入由学生、教师、职员、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学校安全咨询委员会”，共同寻找保证学生在校安全的持久性解决方案。在“东区纪念高中”（Eastside Memorial School），学生在通往学校的每一个入口张贴海报，提醒学生和教职工锁住外门以防止陌生人进入，所有访客都必须从前厅进入并进行登记。^[20]以上项目反映了“公民行动”教育模式倡导的行动性、主体性、反思性等原则，促进学校、周边社区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发生实质性变革。除日常的项目活动之外，“一代公民”还募集资金，每学期末在各项目实施所在地组织“公民日”（Civics Day）活动，将学生聚集在一起以展示他们的公民行动项目，让学生亲身体验项目的影响力以及社区在青年人的领导下发生的改变。根据《“一代公民”2017—2020年战略规划》（Generation Citizen 2017—2020 Strategic Plan），该组织将继续在全美范围内推广“公民行动”教育模式，筹措近745万美元专项资金，与州教育委员会共同推动“公民行动”的立法以及相关政策和条例的制定；扩大“公民行动”资源和项目的实施范围，惠及更多边远地区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21]

参考文献：

- [1]Richard Lerner, et al.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2005, 25(1): 10-16.
- [2]William Damon. What is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C]// Robert W Pears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4: 13-24.
- [3]Richard F Catalano, et al.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Findings on Evaluations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s[C]// Robert W Pears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4: 98-124.
- [4]Neil Humphrey, et al. Measures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011(71): 617-37.
- [5]Roger P Weissberg, et al.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Durlak, et al. Handbook for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New York: Guilford, 2015: 3-19.

- [6]Stephanie M Jones, Emily J Doolittle.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troducing the Issue[J].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017(27): 3–11.
- [7]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Servic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EB/OL].(1990–11–16)[2019–03–13].https://en.wikisource.org/wiki/National_and_Community_Service_Act_of_1990.
- [8]Shelley H Billig. Research on K–12 School–Based Service–Learning: The Evidence Builds[J]. *The Phi Delta Kappan*, 2000(81): 658–664.
- [9][12][14] 梅拉·莱文森. 不让一个公民掉队 [M]. 李潇君, 李艳,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8,212,181–184.
- [10]Alexander Pope, Laurel Stolte, Alison K Cohen. Closing the Civic Empowerment Gap: The Potential of Action Civics[J]. *Social Education*, 2011, 75(5): 267–270.
- [11]National Action Civics Collaborative. Mission Statement[EB/OL]. (2013–05–20)[2019–3–20].<http://actioncivicscollaborative.org/about-us/mission/>.
- [13]Arne Duncan. “For Democracy’s Future” Forum at the White House[EB/OL].(2012–01–10)[2019–02–14].<http://www.ed.gov/news/speeches/secretary-arne-duncans-remarks-democracys-future>.
- [15]Jessica Gingold. Building a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of Action Civics: The Current State of Assess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R]. Circle Working Paper #78. 2013: 10.
- [16]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NCSS). The College, Career, and CivicLife (C3) Framework for Social Studies State Standards: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Rigor of K–12 Civics, Economics, Geography, and History [S]. Silver Spring: MD, 2013: 12.
- [17]Trough an Action Civics Lens: Policy and Advocacy to Support Effective Civics Education Across the 50 States[EB/OL].(2018–11–1)[2019–02–05].<https://generationcitizen.org/wp-content/uploads/2018/11/Through-an-Action-Civics-Lens.pdf>.
- [18]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6 History–Social Science Framework: Instructional Practice for Grades 9–12[EB/OL]. (2016–02–10)[2019–05–01].<https://www.cde.ca.gov/ci/hs/cf/documents/hssfchapter13.pdf>.
- [19]Generation Citizen. Mission and Vision[EB/OL]. (2010–08–16)[2019–05–05]. <https://generationcitizen.org/about-us/mission-vision/>.
- [20]Generation Citizen. Generation Citizen 2018 Annual Report[EB/OL].(2018–11–11)[2019–05–05].https://generationcitizen.org/wp-content/uploads/2018/11/2018-GC-Annual-Report_Web.pdf.
- [21]Generation Citizen. Generation Citizen 2017–2020 Strategic Plan[EB/OL].(2018–02–14)[2019–02–05]. <https://generationcitizen.org/strategic-plan-2017-2020/>.

Action Civics: A New Mode of Civic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

LI Xiaojun

(Center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ew experimental civic education, action civics, was advocated by both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t derives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from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and service learn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hange, it focuses on youth voice, youth expertise, collective action and reflection, so as to promote a new mode of civic education featuring student–centered, project–based and high–quality. In practice, it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mode of civic education in current schools in the US by being introduced into state standards of curriculum and action civics projects.

Key words: action civics; civic edu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责任编辑: 付燕